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

阮 怡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 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 韩国 首尔 03722)

〔摘要〕 金与南宋政权并存多年, 双方聘使往来频繁, 使金文人常写作旅行记以记录见闻及感想。在尊华卑夷的观念和封建宗藩外交关系的双重影响下, 使金文人对女真族形象的刻画充满否定性的描述。宋人自我形象与金国形象始终被设置在华夏与夷狄、文明与野蛮两端。对女真族的描述一方面是对女真族真实生活面貌的反映, 一方面也是使金文人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投射到女真族身上而获得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 宋人不断地否定女真人以此来加强对自我文化大国身份的确认。

〔关键词〕 行记; 女真族; 文化想象;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6-0089-08

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 与两宋政权并存多年。女真族擅长骑射、骁勇善战, 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宋朝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但在经济、文化上都直接继承华夏文明, 处于优势地位。宋与金之间发生过数次战争, 但因双方势均力敌都无法征服对方, 因而互派使者、通和订盟成为解决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自北宋重和元年(1118)宋朝派遣使节赴金商议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失地至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宋金断交, 历经百年宋金聘使往来频繁。宋朝使臣往往创作旅行记以记录出使金这段难忘的经历。使金旅行记的特殊文献价值渐渐受到文史研究者的关注, 他们多据现存的行记文本来探讨行记所反映的金人的社会文化风俗、交聘礼仪等问题, 如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①等文, 将行记

作为真实可靠的文献来展现金人的生活风貌。诚然, 行记都是使金文人对耳闻目睹及亲身经历之事的记载, 为后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但它们并非女真族生活现实的客观记录。旅行者从宋至金游移于不同的地理空间, 总会将自身文化与金地文化相互比较, 在自身社会文化、伦理情感等因素作用下描述眼前的事物。女真族与汉族分属不同的文化形态, 在使金文人眼里, 女真族成为宋人眼中的“他者”。^②使金旅行记文本中描述的女真族形象是在宋人文化语境下塑造出来的异族形象, 是夹杂着宋人思想与情感的混合物, 是对女真族的文化想象。本文着重探讨使金文人塑造了怎样的女真族形象, 并通过宋人看待金人的独特视角, 挖掘这些形象描述背后蕴含的宋人的社会文化心理。

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 女真族是生活

〔收稿日期〕 2016—05—12

〔作者简介〕 阮怡(1984—), 女, 四川雅安人,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研究”(批准号: 14CZW024)阶段性研究成果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成果(2015M570793)。

^① 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② 霍柔在《当代文学理论术语汇编》一书中称:“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进行排外的过程就成了某些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见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4. P. 207

在中原地区以北的多种民族之一，他们长期以狩猎、游牧为生产手段，经济发展缓慢。中原地区的汉族长期处在农耕文明的生产形态中，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儒家的“华夷观”。他们以中原汉族为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离中心越远的地区及生活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被认为越野蛮落后。在这种尊华卑夷、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下，女真人被宋人视为周边众多落后民族之一。宋人以文明人俯视野蛮人的姿态指称金人为“虏”、金朝的朝廷为“虏廷”、金朝统治的区域为“虏地”、金朝的君主为“虏主”。“虏”是中原民族对周边民族的蔑称，宋人大量使用“虏”来指代女真族，成为一种套话。^①而套话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会渗透进宋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使人一提到“虏”就想起女真族，联想到“虏”所具有的野蛮、残暴、落后的品性，形成女真族是蛮夷之族、是需要教化的异类的社会集体想象。^②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周边民族国家建立了以朝贡关系为主的外交关系，周边国家向中国称臣进贡，中国则对周边国家国王进行赏赐、册封，以维持封建宗藩关系。这种以中原民族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在宋金交往中被彻底颠覆，宋金百年交往，时战时和，而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宋重和元年（1118）宋朝遣马政等人使金，商议联金灭辽之事，试图收回曾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地，而金只愿归还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地，坚决不同意将西京、平州、营州、滦州等地归还宋朝。在宋与金的联合灭辽行动中，金人进一步看到宋朝国势衰弱的情形，不仅不归还西京、平、营、滦等地，甚至索要燕地赋税。金灭辽后，与宋败盟，发动攻宋战争并试图灭亡南宋，任凭南宋王朝如何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金都不予理睬。在灭宋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金转而谋求与宋议和，先后签订绍兴和议、隆兴和议，每一次和议对宋朝来说都被认为是屈辱的，南宋须向金称臣、称侄，割让淮河以北大量土地，并岁贡银绢。由此看来，宋金之间，宋朝的地位其实低于金的地位。但在宋人眼中，女真族本应是按期前来朝贡，接受宋朝安抚、教化的夷狄，而

现实中，女真族不仅不向宋称臣进贡，甚至举兵入侵宗主国，俘获二帝、占据中原烧杀抢掠，迫使宋王朝偏居南方一隅并向女真称臣、称侄，昔日的藩属国成为宗主国，这让宋人对女真族充满畏惧、愤恨，对女真族形象的刻画充满否定性的描述。

一、残暴狡猾的形象

使金旅行记中刻画的女真人残暴、凶狠。北宋末年金灭辽后，钟邦直出使金至营州听闻金灭辽时“金国讨张觉，是州之民，屠戮殆尽，存者贫民十数家”。^{[1](P.141)}张觉本为辽朝旧臣，官至辽兴军（平州）节度副使，金军取得燕京以后，张觉接受金朝官职，仍被封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军州事。后又以平州降宋，女真人听说张觉叛金降宋之事后举兵前往平州讨伐张觉，大量屠杀无辜百姓，手段极其毒辣。辽朝曾经入侵后晋，割占了燕云十六州，晋出帝被俘北迁，辽人血腥残暴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淀在汉族人的历史记忆深处，今日的女真人灭辽如同昔日的辽灭后晋，相同的历史情境唤起宋人的历史记忆，亦激活了对女真族的想象——一个比契丹族更强大、更残暴的异族。因此，钟邦直在经显州时见契丹人坟墓被毁就联想到是女真人所为，他说：“契丹兀欲葬于此山（医巫闾山），离州（显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1](P.143)}钟邦直使金正值金灭辽之后不久，战乱后城池破败，百姓生活艰难，盗墓往往可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盗墓者也有可能是当地百姓，而钟邦直受到“女真族残暴”的先人之见的影响，认为掘坟这种暴行只有女真人才做得出来。

楼钥使金记载了金官无论尊卑，只要有过失都会受到杖罚的情形，他说金法规定：“士夫未免捶挞者，太守至，挞同知，又闻宰相亦不免，惟以紫褥藉地，少异庶僚耳。”^[2]这与中原士大夫遵循的“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格格不入。^③特别是宋代统治者遵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对士人优待有加，很少对有罪官员实施杖刑、黥

① “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② 文学史家将其定义为“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即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9-30页。

③ 《礼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刑等刑法。金朝鞭打士大夫的行为更进一步印证了宋人关于女真族野蛮的集体想象。

行记也着重描绘了女真人狡猾贪婪的一面。如钟邦直使金返回，与金送伴使于清州界分别，女真人“各回马，背马回顾，少顷，复数步踌躇，为不忍别之状，如是者三，乃行。虏人情皆凄恻，或挥泪，吾人无也”，刻画出自女真人与宋人分别时一步一回头、惆怅满怀、依依不舍之态。接着又称：“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1]两相对照可看出女真人“不忍别之状”是假，“其将入寇”为真，强烈地讽刺了女真人阴险狡诈的性格。范成大使金见到“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效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3](P.12)女真人建立交钞所，以纸币换取铜钱后将铜钱运往河北。楼钥使金亦见到女真人运铜钱至金上京府库，他说：“接伴所得私覷物，尽货于此，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分附众车以北，岁岁如此。又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途中曾遇蒲筭数杠，导之以旗，殿以二骑，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愠其主人贪墨，以秽语诋之。”金朝城镇商业分为不同的行业、参加同一行业的商人称为行人。接伴使将所得私覷强行卖与商人，变相掠夺铜钱，导致河南百姓生活穷困。又云接伴使安德：“贪沓狠愎，不知何以有政声，益知北方守令，难得循良者。”^[2]楼钥由安德个人所为得出金朝难有好官的结论。在宋人的社会集体想象中，女真人是残暴贪婪的异类，一旦宋人踏上金地遇到女真人，则按先人之见对女真人做出道德判断。

二、尚武少文的形象

使金文人认为女真人蛮横少文，如许亢宗、钟邦直使金，女真人赐宴后宋使按双方交聘惯例进谢表，谢表中有“祇造邻邦”之语，女真人不服与宋使展开争辩，指责宋使“轻我大金国。《论语》云‘蛮貊之邦’，表辞不当用‘邦’

字，请重换，方肯持去”。宋使副许亢宗反驳曰：“《书》谓‘协和万邦’、‘克勤于邦’，《诗》谓‘周虽旧邦’，《论语》谓‘至于他邦’、‘问人于他邦’、‘善人为邦’、‘一言兴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独至诵此一句，以相问也？表不可换，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理会。”^[1](P.145)在宋人眼里，只知中原诗书皮毛的金朝伴使不过是粗鄙之人。

范成大使金“至中山府，寇依旧名曰定州，有东坡祠”，^①他在此地作有《东坡祠堂》、《松醪》二诗：^[4](P.154)

化原坊里尚羹堂，闻道苏仙有奉尝。
想见当年行乐处，牙旗铁马照金章。

松风漱罢读离骚，翰墨仙翁百代豪。
一笑毡裘那办此，当年嵇阮尚铺糟。

苏轼曾任定州知州，此地留有苏轼的风流雅韵，如今却只有那些住在毡帐、身穿皮裘、以武力自矜的女真人，这些女真人哪里懂得中原文士的文采风流。范成大使金见到馆伴使后还作有《耶律侍郎》一诗，^[4](P.154)云：

乍见华书眼似獐，低头惭愧紫荷囊。
人间无事无奇对，伏猎今成两侍郎。

写馆伴使兵部侍郎耶律宝不识字，愧对其职位。“伏猎”用户部侍郎萧灵一事，《旧唐书·张九龄传》载：“萧灵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按：严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灵读之曰：‘蒸尝伏猎。’灵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5]³¹⁰⁵萧灵将《礼记》中的“伏腊”读作“伏猎”，此诗借萧灵之事嘲讽金官不识字，文化素质低下。

女真人不识字本无可厚非，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女真族使用的女真大字为金太祖时期所制，“太祖命希尹（按：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按：“女直”即“女真”）”。金熙宗时期又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为女直大字，熙宗所撰为小字”。^[6](P.1684)女真人不识字并不能说明文化水平低下，但在使金的中原士大夫看来，这些不知

^① 范成大《揽轡录》节文，【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2页。

汉文化，不懂诗书的女真人是尚武少文的异族。

相反，熟悉汉文化的女真人往往受到宋人的称赞，如楼钥称接送伴使安德“道中颇读《庄子》，故临事间有可观”，又称金官左宣徽使敬嗣晖“雍容庄重而善应接，尝使于我，尽记朝仪以归。国中典章礼文，多出其手”。^[2]敬嗣晖因为懂得中原朝仪所以得到宋人赞赏。宋人以汉文化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女真族的文化素养，这显然受到华夷观的深刻影响。他们以华夏文化为标准来审视周边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忽视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形式，显示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与自满。

范成大使金期间还目睹了金朝学习汉文化的情形，介绍了女真官制的概貌，认为女真族仿汉族建立了官制，有三师、三司之职，设尚书省、六部等机构，又设置佩服之制，设文散官、武散官等官位，仿汉族使用年号。^①其实，早在金熙宗时期，女真统治者就任用汉人为金朝建立各项典章制度，金朝的政治制度由女真的勃极烈制度转化为汉官的三省制，其后，海陵王、金世宗都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以巩固金朝的统治。但范成大对金朝的汉化制度颇有微词：“虏既蹂躏中原，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虏主既端坐得国，其徒益治文，为以眩饰之。”^{[3](P.16)}出于女真族是蛮夷异族的想象，范成大认为即使他们有学习中原文明的意愿，也只能得其皮毛，不可能成为中原文明的真正继承者。事实上，金朝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文化，一方面也试图显示出与汉族制度的差异，在机构、命名、分工上都与汉人官制有所区别。范成大通过矮化女真人学习汉文明的行为塑造了女真族迥异于宋人的“他性”，以此来表明金朝的统治是不合理的，只有中原民族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人。

三、野蛮落后的形象

宋人还在旅行记中从饮食、服饰、婚俗、祭祀等各方面塑造了女真人野蛮落后的形象。

(一) 饮食

北宋晚期，女真族仍以畜牧业、狩猎业为主，饮食多肉食，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了女真人待宋使的食物为“猪、鹿、

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并且“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子，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1](P.143)}女真人还喜欢腥味较重的食物。女真人在清州款待宋使的食物为“酒五行，进饭，用粟，钞以匕。别置粥一盂，钞以小勺，与饭同下，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心脏淪羹，笔以韭菜”，在肉类中浸渍醋、生血等物并配以芥子、韭菜等辛辣品。即《大金国志》所云：“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7](P.553)}女真族的饮食常有生食、膻腥之物，这种饮食习俗与宋人大不一样。宋人有发达的农业文明，食物包括五谷、蔬菜、肉类、水果等丰富多样的品种，亦有较高的烹饪技术。在中原士人眼里，食物的精细程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8](P.2495)}宋人一进入金地就以一种文明人俯视野蛮人的态度称女真人的饮食“秽污不可向口”。即使到达金廷，金人以盛宴招待宋使，宴会场面豪华隆重，“前施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牙”，但宋人亦以苛刻的眼光认为食物“但差精细而味和耳”。^{[1](P.145)}

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使金，此时女真人已统治中原地区40多年，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楼钥至金南京城（原北宋旧京开封城），女真人置办的宴会上的饮食为“初盞，燥子粉，次肉油饼，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样贮四十楪，比平日又加工巧，别下松子、糖粥、糕糜、里蒸蜡黄、批羊饼子之类，不能悉计。次大茶饭，先下大枣豉、二大饼、肉山，又下【火赞】鱼、醢豉等五楪，继即数十品源源而来，仍以供顿之物杂之，两下饭，与肚羹，三下饼子，五下鱼，不晓其意，盖其俗盛礼也。次饼餠三，次小杂椀，次羊头，次烤肉，次剉子，次羊头假鳖，次双下灌浆馒头，次粟米、水饭、大簇钉，凡十三行”。食物已改变了往日单一的结构，变得丰富多样，既有鱼、羊等肉类，又有粟、麦、豆、枣等各类食品。制作工艺也由粗糙变为精巧，与汉族的饮食习惯相差无几。楼钥评

① 参见范成大《揽警录》节文，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第1758页。

价女真族的饮食曰：“自南京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家饌。”^[2]女真人已经汉化的饮食得到楼钥的赞许。

（二）服饰发俗

范成大的《揽辔录》记载了汉人深受女真族发俗影响的情形：“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鸱鹞，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女真人的发式是将头顶四周头发剃去，只留顶后中间长发，编成辫子垂于身后。而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宋人认为服饰可以体现人类的礼仪教化程度，束发戴冠才是文明的象征，脑后垂辫是野蛮落后的蛮夷之俗，因而称女真发式“蓬辫如鬼”，将女真人描述成异类、丑类。剃发垂辫的习俗源于女真人对萨满教的信仰，萨满教认为天可以应地，地亦可应天，天人相通。发辫位于人的顶部，与天最接近，是人的灵魂的栖息之地，故而对发辫特别重视。另一方面，女真人长期以畜牧、狩猎为生，剃发垂辫能有效避免骑射时头发遮挡视线，或头发被周围的障碍物牵扯，这样的发式也是生产、生活使然。女真人的剃发垂辫与宋人的束发戴冠都是各民族不同的服饰习俗而已，并无野蛮与文明之别。范成大又曰“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3](P.12)范成大使金见到受女真族影响的汉族妇女很少戴冠，男子亦只有巾而无冠，他认为女真人戴的鸱鹞巾远不如宋人的冠带精美，其《鸱鹞巾》一诗云：

重译知书自贵珍，一生心愧鸱鹞巾。

雨中折角君何爱，帝有衣裳易介鳞。

诗下小注云：“接送伴田彦皋爱予巾裹，求其样，指所戴鸱鹞有愧色。”^[4](P.147)认为女真人羡慕宋人冠带，因其所带罗巾不如宋人的美观而感到羞愧，并自豪地称颂汉民族有创建衣冠制度的帝王圣君。“介鳞”指甲虫和鳞虫，比喻野蛮未开化的衣着。“衣裳易介鳞”指衣冠礼制的推行使得臣民摆脱蒙昧走向文明，言下之意是奚落女真人没有文明的服饰，尚处于落后的“介鳞”阶段。

《北辕录》亦记载周辉经过原北宋东京城时

见到女真人的服饰为“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衫皆极宽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纁丝，或番罗系版绦，与皂隶略无分别，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着尖头靴。所顶巾谓之鸱鹞”。^[9](P.2587)周辉注意到女真族的有官者与衙门差役、普通百姓都一样，服饰无贵贱之别，这与宋人的服饰习俗亦有区别。在早期的儒家经典《礼记》中就已对人们的服饰做了严格的规定，儒家认为服饰的面料、样式、配饰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应根据不同的地位穿着不同的服饰。穿着贵贱有别的服饰是儒家礼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周辉对女真族服饰无贵贱之别特别在意。其实，金统治了北方大片地区以后也仿宋朝制订了舆服制度，金世宗、章宗时期制定了一系列官民衣着穿戴的制度，目的是使“贵贱有等”。^[6](P.984)就在周辉使金前一年即大定十六年(1176)“世宗以吏员与士民之服无别，潜人民间受赋鬻狱，有司不能检察，遂定悬书袋之制。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纁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并于束带上悬带，公退则悬于便服，违者所司纠之”。^[6](P.986)专门制定“悬书袋之制”以区分官位不等的官员与士庶。周辉使金在途中见到女真人大致相仿的衣着打扮时，出于对女真族是野蛮落后民族的想象就武断地认为女真族的服饰无贵贱之别，而未仔细辨别官员与士庶服饰的细微区别。

（三）婚俗、葬俗

楼钥使金听闻“接伴使之兄左丞安礼，罢为沧州刺史。初，安礼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辞以不当复娶妻姪，强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救坐之”。^[2]妻死复以同姓侄女为妻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汉人的伦理纲常，楼钥闻此与自身价值观大相径庭，因而极有兴致地记入行记中，凸显出金人“荒淫乱伦”的形象。而在女真族婚俗里，“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6](P.1542)“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10](P.9)妻死复以同姓侄女为妻的做法正是这种婚俗的体现。

范成大使金至邯郸县见“墙外居民以长竿

磔白犬悬其首，别一竿缚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3](P.14)} 并有感而发作《邯郸驿》一诗云：

长安大道走邯郸，倚瑟佳人怅望间。

若见臃脰似今日，汉宫何用忆关山。

邯郸为汉高祖宠妃戚夫人的故乡。诗作以假想的口吻描写汉宫中的戚夫人日夜思念故乡邯郸，如果她知道故乡的山河已被女真人所玷污，应该不会再思念故乡了吧！设竿祭天本是女真人拜天的习俗，以此方式祈求天神的福佑，在此被范成大认为是粗俗不堪之举。

四、奢侈劳民的形象

范成大至金朝南京城（原北宋旧京开封城），见到经金人修葺后的汴京宫殿比北宋时期更加壮丽，但他只用了“五门如画”、“廊亦如画”等平实的语言记录了宫殿的外观，并未渲染宫殿的壮丽之美，反而着力强调民间的荒败景象。他说：“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3](P.12)} 将壮丽的宫殿与民间的荒凉景象进行对比，认为金统治者只会大兴土木，而不体恤百姓，表达了对其奢侈生活的批判。在此地，范成大还有《京城》一诗，^{[4](P.148)} 曰：

倚天栉栉万楼棚，圣代规模若化成。

如许金汤尚资盗，古来李勣胜长城。

范成大由眼前城池回忆北宋时期开封城内曾有的楼阁鳞次栉比的繁荣景象，将其看作是圣主明君时代的象征。其实，金朝南京城虽经过金人的修葺，但总体布局与北宋时大体一致，范成大详细地描述了南京城的布局：

循东御廊百七十余间，有面西棂星门，大街直东，出旧景灵，东宫也。过棂星门，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虏改为承天门。……出樊楼街，转土市马行街，出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虏改为玄武门。门西金水河，旧夹城曲江之处。……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

过清辉桥，出新封丘门，旧景阳门也，虏改为柔远馆。^{[3](P.13)}

从加着重符号的语句来看，金人沿袭了北宋人兴建的开封城的城市以及宫殿布局，只是稍加修葺，改变部分宫殿、楼阁、城门名称而已。在范成大前一年使金的楼钥也称旧东京城内宫殿“新造亦如旧制”，^[2] 《大金国志》“汴京制度”条亦曰：“宫室制度金国时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旧也。”^{[1](P.473)} 同样的宫殿与北宋统治者相联系时，它是圣贤的代称，而一旦将壮丽的宫殿与金朝统治者相联系时，这种象征意义消失殆尽，金南京城华丽雄伟的宫阙成为金统治者奢侈劳民的象征。

范成大至金朝国都燕山城，亦详细描绘了都城的布局、规模，认为城门外的龙津桥用燕石砌成，“石色如玉，桥上分三道，皆以阑隔之，雕刻极工”，燕山城内的宫殿“东西两角楼，每楼次第攒三檐，与挟楼接，极工巧”。^{[3](P.13-15)} 但是燕山城宏伟壮丽的建筑并未得到范成大的赞叹，其《燕宫》一诗曰：^{[4](P.156)}

金盆濯足段文昌，乞索家风饱便忘。

他日楚人能一炬，又从焦土说阿房。

段文昌为唐宪宗、穆宗时人，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授剑南西川节度使，官宦显达、出将入相，服饰玩好、歌童妓女，一一取之以尽乐，生活奢侈过度。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亦奢侈铺张，最终导致亡国。范成大以段文昌、秦始皇奢侈腐朽的生活来暗讽金朝统治者如此骄奢，不体恤百姓，最终也只能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范成大有《龙津桥》一诗：^{[4](P.154)}

燕石扶栏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回。

西山剩放龙津水，留待官军饮马来。

表达出希望金朝因奢侈而亡国之日也正是宋人北复中原之日的心理。他在《揽辔录》中还明确表明了对金朝修筑宫殿的看法：“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3](P.16)} 借雄伟、华丽的燕山城来批判金朝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劳民伤财。

在范成大之后使金的周辉亦在《北辕录》中提到燕山城的工巧，如记龙津楼（按：范成大《揽辔录》作“龙津桥”）曰：“楼亦分三道，通用夺玉石扶阑，上琢为婴儿形，极工巧。”并评价道：“北宫营缮之制，初虽取则东都，而竭民膏血，终殫土木之费，瓦悉覆以琉璃，日色晖映，楼观翬飞，图画莫克摹写。佐佑之初，役民、兵一百二十万，数年方就，死者不计其数。”^{[11](P.2587)}周辉与范成大的批判口吻完全一致，都将壮丽如画的宫殿作为金统治者竭民膏血、奢侈浪费的标志。

嘉定四年（1211）年使金的程卓评价燕宫亦曰：“虏廷宫阙侈甚，乃炀王亮所作。”又云：“入门内山棚，名元庆，其下左右各障以锦，为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结，各缚为彩狮子，凡二十棚。前剪彩，为花数十株，又以彩为金狮、玉象各一，徒闻用此为美。”^{[11](P.443)}程卓亦由燕宫的华丽联想到金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

在范成大之前，女真族的形象还只是“残暴狡猾贪婪”、“野蛮落后”、“尚武少文”等社会集体想象的复制品，而“奢侈劳民”的形象则是范成大、周辉、程卓等使金文人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新文本”。范成大在《揽辔录》中塑造了女真人骄奢的形象，通过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朝国内的读者认识到金人除有“野蛮落后”的形象特点之外，还有“奢侈劳民”的一面，为宋人关于“女真族的集体记忆”增添了新的元素。后出使金的宋使在使金过程中，带着对女真族“奢侈劳民”的前理解来塑造女真人的形象，一旦见到华丽的燕山城，就与女真人的“奢侈”作风相联系起来。

金国宫殿豪华、女真人奢侈的形象一方面是对金国现实的某种反映。金朝定都燕山城称为中都，经济从战后的萧条状态中慢慢复苏，统治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营建燕山宫殿，历时三年才完工。《大金国志》“燕京制度”条详细记载了燕京宫殿的布局：

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四旁又设两门……此外

有宣阳门，即内城之南门也……通天门即内城之正南门也……宣华乃内城之正东门，玉华正西门也。^{[7](P.470)}

整个宫殿分为外城、都城、内城三道城垣，規制宏大且金碧辉煌，显得极其壮丽。

另一方面，这也受到宋人对于女真人的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宋人无视壮丽的燕山宫殿所蕴含的金人的精湛建筑技术，却总是有意强调宫殿的豪华，以贬斥金朝统治者的奢侈作风。其实北宋的东京城内威严华丽的宫殿何尝不是耗费巨资修建而成的呢？但在使金旅行记中，宋人提及北宋东京城时却从未使用北宋统治者骄奢、不体恤百姓的话语。前文所引范成大的《京城》一诗即通过北宋东京城的繁华景象来称赞北宋统治的圣明。而且，当使金文人经过旧东京城时，见到“城外人物极稀疏”，“城里亦凋残”，“景德、开宝寺二塔，并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颓毁已甚，金榜犹在”，“栾将军庙颓垣满目，皆大家遗址”，^[2]“人烟极凋残”^{[9](P.2587)}的场面时，心中充满了对旧日繁荣胜景的追忆和眼前衰败景象的叹息。宋人将雄伟壮丽的燕山城、金南京城视为金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的标志，这反映了宋人对于金统治集团的一种心理期待，认为金人的统治是腐朽的、终会灭亡的，中原地区不会长久沦落在异族手中。

结 语

使金行记中刻画出残暴狡猾贪婪、尚武少文、野蛮落后的女真族形象，对女真族的描述一方面是对女真族统治者真实生活的反映，一方面也是怀揣着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想法对女真人形象做出的选择性重组。在宋金军事力量较量中宋弱于金，这是宋代士大夫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他们踏上金朝的土地，这种屈辱感尤其强烈，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打量女真族的举止习俗，看到的全是女真人的落后不堪，觉得他们的野蛮落后如同一面映照自己的镜子，越发从中看到了自身文化的先进和强大。女真族蛮夷异族的形象是使金文人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投射到女真族身上而获得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一种文化想象。宋

人自我形象与金人形象始终处于华夏与夷狄、来加强对自我文化大国身份的认同，在否定文明与野蛮两端。宋人不断地否定女真人以此“他者”的同时言说了自我。

〔参考文献〕

- 〔1〕钟邦直.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G] /三朝北盟会编. 卷二 O.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楼钥. 攻媿集 [G] 卷一一一//四部丛刊 354 册,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3〕范成大. 揽轡录 [G] //范成大笔记六种,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范成大. 范石湖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5〕刘昫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脱脱等. 金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宇文懋昭撰, 崔文印校证. 大金国志校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何晏注, 邢昺疏. 论语注疏 [G] //十三经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9〕周辉. 北辕录 [G] //说郛三种. 宛委山堂本卷五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10〕宇文懋昭. 金志 [G] //丛书集成初编. 第 3903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1〕程卓. 使金录 [G] //续修四库全书第 42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Chinese and Barbarians: the Cultural Imaginary Description of Jurchen Image

RUAN Y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03722)

〔Abstract〕 The Jin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coexisted for many years. They mutually sent envoys for political purpose. Ambassadors of the Jin often wrote travel notes to record their overseas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idea of respecting Chinese and despising Barbarians and the feud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zerain state and vassal state, they described the image of Jurchen negatively. The self-image of the Song and the Jin always represented civilization and savagery. On the one hand, the description of Jurchen reflected the real lif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the ideological image influenced by Jin people's own social culture. People of the Song had constantly denied "the other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identity of a big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 travel notes; Jurchen; cultural imaginary;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李 劼〕